

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浙江经济增长

黄速建 余著

【摘要】“十五”时期,浙江克服了经济运行环境中的种种不稳定性因素,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取得长足的进步。通过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浙江正确处理长期发展与眼前利益的关系、经济改革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及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关系,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效结合起来,将中央各项政策方针落在实处,在实践中走在前列,在确保经济平衡较快增长的同时,初步实现了从以数量扩张型的经济增长为主的发展格局向质量提升型的经济与社会、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发展格局的转变。这为“十一五”时期浙江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奠定了良好基础。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增长;浙江

【中图分类号】F127.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06)20—0033—07

一、浙江经济总量情况

浙江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活力最强的省份之一,它以全国 1.06%的国土面积和 3.75%的人口,创造了全国 7.33%的生产总值和 6.69%的财政收入。浙江各项重要经济指标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名位居前 3—5 位之列,而改革开放之初,浙江省在全国排名基本处于第 12—15 位的水平。这种排名次序的显著变化,反映出了 20 多年来浙江通过经济高速增长,实现从一个经济实力处于中等水平的省份向一个经济大省、强省转变的发展趋势。

1. 土地与人口

浙江是我国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陆域面积 10.18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 1.06%。在有限的陆地面积中,山地丘陵占 70.4%,河流和湖泊占 6.400%,平原和盆地占 23.2%,故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浙江人口总数占全国总人口数的比重基本保持在 3.5%—3.7%的水平。2005 年底,有关部门根据 1%人口抽样调查得出的浙江省常住人口数量为 4898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数比重提高到 3.75%。

2. 地方生产总值

从 1991 年开始,浙江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连续 10 年高于全国 GDP 的增长速度。这期间,浙江经济两度呈现加速增长态势,第一次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第二次从 2002 年开始到现在。伴随这两阶段的经济加速增长,浙江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迅速提升。2004 年,浙江成为我国第四个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的省份。2005 年,浙江生产总值为 13365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7.33%;而在 2000 年和 1991 年,这一比重分别只有 6%和不足 5%,至于改革开放之初的 1978 年,这一比重仅为 3.34%。伴随浙江经济的快速增长,前些年浙江生产总值增量对我国 GDP 增量的贡献率呈现出稳步提高的发展态势。2003 年,浙江对全国 GDP 增量的贡献率一度超过 10。过去两年,受资源与要素制约的影响,这一贡献率有所下降。

3. 人均 GDP

人均 GDP 是评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用于衡量一个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程度的基础性指标。浙江是我国第

一个(不包括直辖市)人均 GDP 超过 3000 美元的省份。有研究以该指标作为重要衡量标准,浙江的经济发展进程大约比全国超前 10 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如表 1 所示,从 1992 年开始,浙江人均 GDP 加快增长,1998 年,突破 1000 美元大关。1998—2001 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0 年世界经济阶段性衰退的影响,浙江及全国的人均 GDP 的增长速度同步放缓。2002 年,浙江人均 GDP 突破 2000 美元,重新回复较好的增长势头。2005 年,达到 27369 元,按汇率折算处于 3400 美元上下的水平,将近同期全国人均 GDP3985 元的两倍,而在改革开放之初的 1978 年,浙江人均 GDP 仅为全国水平的 87%。

表1 1978年以来重要年份浙江人均GDP的增长情况

年份	人均 GDP (单位: 元)		浙江人均 GDP 对全国人均 GDP 的倍数
	全国	浙江	
2005	13985	27369	1.96
2000	7858	13461	1.71
1990	1644	2122	1.29
1978	331	381	0.87

资料来源:表中“全国生产总值”及2004、2005年“浙江人均GDP”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摘要2006》;其他年份的“浙江人均GDP”的数据来源于《浙江统计年鉴2005》。

4. 财政收入

从 1993 年开始,浙江财政收入连续 13 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尤其是 1998 年以来,浙江财政收入的绝对量及相对比重保持了加快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过去的八年时间里,浙江财政收入从 1998 年的 401.8 亿元提高到 2005 年的 2115 亿元。这些年中,除 2005 年外,浙江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一直高于同期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长率,浙江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 1998 年的 4.07%提高到近三年的 6.700/上下的水平,浙江财政收入占本省地方生产总值的比重则从 1998 年的 8.06%提高到近三年的 15.5%以上的水平。

5. 城乡居民收入

浙江经济“藏富于民”的特点非常突出。1978 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是 360 元和 165 元,前者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后者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 1.24 倍。到 2005 年,这两项指标分别提高到 16294 元和 6660 元,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1.55 倍和 2 倍,均居全国第三位、省区第一位(仅居于上海和北京之后)。到 2005 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连续五年和 21 年保持在各省中排名第一的领先地位。

二、浙江经济结构特点

当前浙江经济的发展状况可以用三个结构性的转变来概括:第一个转变是所有制结构从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较高向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较高的结构的转变。这个转变已经基本完成;第二个转变是三次产业结构从“一二三”向“二三一”、再向“三二一”的结构的转变。这个转变正在进行中,前一部分的转变初步完成,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已经趋于合理,但第二产业的比重偏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偏低的结构,仍有待进一步改变;第三个转变是伴随经济总体实力的不断增强而发生的,即浙江正在酝酿的区域经济格局上的重大转变,从以省内发达地区为主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协同发展的经济结构的转变。

1. 所有制结构

浙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发地区,较早地实现了从公有制经济占比较高向非公有制经济占比较高的所有制结构的转变。1978年,浙江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增加值约为7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仅为5.7%。1990年,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也仅为18.5%。到1997年,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1775亿元,所占比重提高到38.3%。进入新世纪,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省比重以每年五个百分点左右的幅度加速增长,到2005年,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为9556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高达71.5%。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增加就业的重要渠道,全省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已占到全部从业人员的53.9%,成为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全省非公有制经济税收收入达到734.47亿元,占全部税收收入的30.7%;成为社会投资的重要来源,全省限额以上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额达2210.89亿元,占52.9%。

浙江所有制经济的特点是:(1)个体私营经济发达是非公有制经济的主体,港澳台和外商投资的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较小;(2)所有制结构的转换,主要靠非公有制经济中迅速增长的个体私营经济对公有制经济中除国有经济以外的其他公有制经济的替代完成。浙江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38.6%下降到1990年的28.4%和1997年25.0%，“十五”期间,其比重稳定在20%以上的水平。目前,浙江形成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虽然它的国有经济比重在全国处于最低水平,但国有经济总量在全国各省市中居于前列。由于国有经济集中在关键性、基础性领域,它们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得到了有效保证。

2. 产业结构

浙江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其产业结构特点是:一次产业占GDP比重比较合理,二次产业所占比重偏高,超过50%;三次产业所占比重偏低,约为40%。2005年,浙江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比例关系是6.5:53.5:40,同年,全国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是12.4:47.3:40.3(如表2所示),从二者对比可以看出:(1)浙江第一产业占比显著低于全国水平,这表明浙江的工业化进程领先全国水平,基本完成从“一二三”向“二一三”的产业结构转变;(2)浙江和全国一样,处于从“二一三”向“三二一”的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关键任务是要提高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按照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标准,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应该在6000/—8000/的水平。而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水平上,三次产业比重一般应该在45%以上。

表2 2005年浙江与全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及相应比例关系对比表 (单位:亿元)

项目	全国	浙江	浙江所占比重(%)
国内生产总值	182321	13365	7.33
第一产业增加值	22718	873	3.84
第二产业增加值	86208	7147	8.29
第三产业增加值	73395	5345	7.28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	12.4 : 47.3 : 40.3	6.5 : 53.5 : 40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6》。

从就业人员的产业分布看,浙江就业结构的变化相对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2005年,浙江一次产业仍然吸纳了超过20%的就业人口—虽然这一比重远远低于同期全国的接近45%的水平。其经济含义是,从“一二三”向“三二一”的产业结构转变仍有待深入,二次产业和三次产业的高增长应该带来与之相匹配的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3. 地区差异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浙江省内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差异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进入“十五”时期,浙江省委、省政府开始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到2005年底,虽然我们用主要经济指标来衡量,欠发达地区在全省范围内仍然处于较低的地位和发展水平,但从近两年的经济运行情况看,这些欠发达地区已经呈现出加快发展的良好趋势。比如,2000—2004年丽水市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在全省位居第二位。再如,2005年,衢州市经济社会发展七项主要指标中,有五项目标增幅高于浙江省平均水平。总体看来,“十五”时期,浙江省内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差异扩大化的趋势基本得到有效控制,今后一段时期,浙江将逐步实现从以省内发达地区为主的区域经济结构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协同发展的区域经济结构的转变。

三、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制约因素

浙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制约因素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然资源与环境条件的“硬”制约;二是来自社会性因素的“软”制约。浙江还是我国人口迁移增长的一个重要区域,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口向这些地区集中。数据显示,“十五”期间,每年省外净流入浙江的劳动力达15万人左右。过去十多年来,外来人口密集化的发展态势,正使得浙江人均资源拥有水平低的问题表现得越发突出。同时,也对浙江的社会承载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1. 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约束

浙江经济的快速增长,对资源供给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一方面,土地这类无法从外部引进的资源的成本迅速上升,另一方面,其他可以从外部引进的资源的供给保障压力及资源对外依赖度越来越大。而大规模的非集约化的资源耗费又不可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最终表现为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与日突出。

(1)主要资源的约束状况。浙江是资源小省,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位居全国倒数第三位。根据这些年的消费方式及能力测算,到2010年,浙江对用地、能源、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的需求量都将大大超出省内可利用资源存量或现有资源供应能力。

(2)资源的粗放消耗。目前,浙江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还是依赖大规模的资源投入来实现的,经济增长的粗放式特征非常突出。从资源消耗量看,这些年来,一些重要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快于或接近其GDP增长速度;从资源消耗与产出的关系看,2003年,浙江每千克标准煤产出GDP为1.5美元,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世界平均水平低30%以上,不到高收入国家的一半。吨钢综合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巧%—30%,耗水量是世界先进水平的2.7倍,粉尘排放量是世界先进水平的10倍。2004年,全省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38%,仅略高于“十五”计划指标70%的一半。

(3)环境污染状况。经济的快速增长及这个过程中以相对粗放的方式进行的大规模资源耗费,给浙江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面对严峻的形势,浙江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全省环保投资规模从1998年的7.13亿元提高到了2004年的210.26亿元,六年增长了28倍,占当年GDP的比重从0.14%提高到1.87%。目前看来,浙江经济结构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步伐与其经济增长水平仍不配等,这可能跟两个原因有关:一是历年来的生态环境欠账太多;二是已经出台的政策及付出的技术创新的努力存在时滞效应。

2. 社会性因素的约束

伴随经济快速增长及此过程中外来人口的迅速增加,社会性因素的制约作用日益突显。为改变社会发展滞后经济发展的状况,浙江提出了建设科技强省、教育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目标。针对人口扩大趋势的刚性特点及外来人口迅速增加的实际,浙江一些地区开始为连续居住一段时期的流动人口提供与当地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1)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短缺。“十五”期间,浙江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经济发展,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交通等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与城市相比,农村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水平更低,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更为落

后。不少农村公共产品建设仍然必须靠农民自己来实现。随着浙江经济体制改革步入攻坚阶段,适应新形势的社会公共管理体制、机制在短期内还未能建立起来,这也对社会治安和维护社会公平构成了艰巨的挑战。针对上述问题,近些年来,浙江在促进社会稳定和加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做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在公安部民意调查中,浙江省 87.7% 的被调查群众认为有安全感,高出全国 6.35 个百分点,居全国首位。

(2)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浙江社会保障体系还处于发展的不成熟阶段,社会保障覆盖面及保障力度都比较有限,尚未发挥好社会稳定器和安全网的作用。在社会救济方面,还没有完全实现“保基本”的要求;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不够宽,相当多的流动务工人员没有进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在许多行业,由于员工流动性太大和制度设计造成的企业用工成本过高,因此,企业仍然缺乏参保的积极性;农村社会保险进展相对缓慢。

四、进一步发展经济的思路与对策

回顾过去近 30 年时间的发展历程,浙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阶段,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构筑了坚实的区域竞争优势。最近五年左右的时间里,浙江出现了新的变化,逐步转入一个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当前,浙江步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与此前的发展阶段的区别在于,其发展目标中加入了更多的对非经济性因素的考量。这个转变的发生,一方面,是以前一阶段所创造的丰富的物资财富为前提和基础的;另一方面,也是改变前一阶段改革与发展中物资、经济因素相对超前于非物质、社会因素的发展的状况的必然选择。

1. 必须确保经济发展中的足够快的增长速度

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将表现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特征。但是,这种经济增长的机理与此前发展阶段的机理是不同的。后者以经济因素为主要推动力,建立在对社会因素的暂时忽略和规避的基础上。而前者将以社会因素为主要推动力,它将建立在社会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促进作用的基础上。这个规律意味着,确保经济发展中的足够快的增长速度,不仅仅将是为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而需要我们去追求的目标,它还将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结果。

确保经济发展中的足够快的增长速度,绝对不是要人们去追求大跃进式的经济增长,而是指要去争取在资源与社会可承载的条件下最好水平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发掘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和经济增长的潜力。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越快,给经济社会带来的负面性也会越大,弊大于利。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消极的。只有当经济增长过快,超出客观上的资源与社会承载能力太多时,才会出现不必要的代价。我们需要在确保经济发展中的足够快的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减少这种不必要的代价,但绝对不能因噎废食,因此而全面放弃经济增长的努力。

2. 积极实现向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和“绿色 GDP”的政绩观转变

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环境这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十五”时期之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以纯粹的经济目标为主,“十一五”规划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的根本变化是:我国的发展目标不再单纯强调经济目标的实现,而要在以经济发展为主的目标体系中同时嵌入重视人文与社会、自然与环境等其他方面的目标。换句话说,即便是经济目标是重要的,我们还必须为经济目标带上非经济性因素的约束条件—不再单纯强调经济的发展,而要强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不再单纯强调 GDP 增长,而要强调资源与环境条件约束下“绿色 GDP”的增长。伴随发展战略目标的战略性转变,政府的政绩观念也在发生相应变化。

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心任务是要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从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入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引导社会向全面小康迈进,使全体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最终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以常用的人均 GDP 这个指标作为小康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准来衡量,浙江在满足老百姓的根本需要方面一直走在前列。20 世纪 90 年代末,出现过一些对浙江经济发展快而社会事业发展落后的批评,而最近几年到浙江去,可以发现,在经济基础日益夯实后,浙江的各项社会事

业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并且又为经济增长及最终实现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注入新的推动力。从持续的经济增长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浙江正处于一个水到渠成的转型阶段。

浙江的不少地市在人均 GDP 达到 3000—5000 美元的水平前后,其经济体系内部正在滋生出一种自下而上,自发自觉地追求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相和谐的力量。受这种新生力量的支配,浙江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所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在尽可能不损害市场竞争效率的前提下,通过政府、企业乃至个人,借助市场这只配置资源的效率之手,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反哺社会事业、增加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救助弱势群体、向欠发达地区进行转移支付和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当各级政府部门自觉和不自觉按照以人为本和社会公平的要求,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使改革的成果惠及越来越多的人群,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内生的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就突显出来,市场经济高效运转的社会基础也被一步步夯实。

3. 加强体现资源与环境价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必须通过日臻完善的体制与机制创新来实现。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浙江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所依托的体制机制,能够充分体现资源与环境价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以来到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浙江在应对和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与矛盾的过程中,探索性地建成了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的经济运行机制。这种体制机制既能体现出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又能卓有成效地发挥出市场竞争的效率优势,它们是浙江成功构筑经济先发优势的制度发动机。而在当前的发展中,浙江面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新任务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立足已有的体制优势,发展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机制,进一步向更为成熟的、更为理性的、能够充分体现资源与环境价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和升级。

过去几年中,浙江上上下下以各种形式,对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生态环境破坏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负面性进行反思。现在,基于统一的思想认识的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正在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作用,同时体现在微观经济实践和宏观经济政策之中。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不少浙江企业节能降耗实践超前于当地政策,甚至带动了相关政策的制定。这种实践的超前性说明,来自市场经济体制内部的自我行为动力是强劲的,而资源与环境的稀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折射出来,构成自我调节的能动力量。

4.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浙江经济当前已经基本完成了所有制结构的转变,今后一段时期经济结构转变的重点和难点是产业结构的转变。同时,更深层次的区域经济结构的转变也将建立在各个地区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基础上。浙江的产业结构转变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

(1)进一步调整三次产业结构,完成从“二三一”向“三二一”结构的转变。从 1987 年到现在的将近 20 年的时间里,浙江的三次产业格局不断向“二三一”的结构固化,二产一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三产发展滞后于整个经济发展的进程,并日渐成为制约浙江经济加快发展的瓶颈因素。未来浙江三次产业结构转变的中心任务,是要在继续保持制造业快速增长态势的前提下,加快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转变二产与三产各自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的高低关系。

(2)实现制造业的优化升级。浙江是资源小省,制造业以“两头在外”的模式发展起来,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大都是相对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兼具劳动力密集与资本密集的轻纺、化工、机械等传统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发展滞后。“十五”期间,浙江在土地、劳动力、能源、原材料、运力等要素制约方面及国际贸易摩擦方面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传统制造领域的企业受到很大的冲击。有过这样一段成长中的“烦恼”经历后,浙江政府及企业有了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去淘汰控制高能耗、高污染项目,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资源集约利用的水平与能力,转变沿袭多年的粗放式的、以外延扩张为主的工业发展模式,积极延伸产业链和产品链,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改善企业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当前,浙江一些制造业集群已经出现了向

分工日益发达、产业关联效应日益显著、产业体系日益完善及综合竞争力日益提高的方向发展的良好态势。

5. 增强全社会的科技创新能力

这些年来,浙江的科技投入呈现稳步增长。浙江的科技创新活动有两个特点:一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应用导向型的科技创新活动非常活跃。浙江的科技资源储量非常有限,但浙江企业的创新精神及科技资源的引进、吸收和利用能力很强。通过依托市场竞争机制,不断引进科研院所,引进科技人才,购买现成的科技成果或购买先进的生产设备,浙江企业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逐步得到确立、巩固和提高;二是财政科技投入力度大,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浙江各级政府都设立了数千万元不等的专项资金奖励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在财政科技投入总额快速增长的同时,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发挥财政科技投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带动力的问题,其工作举措包括:抓重点、重大技术项目及共性关键技术攻关项目,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标准化,抓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完善产业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等。这些年,浙江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职业技术学校的扶持力度,为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培养和输送技术人才。

浙江的科技创新活动也存在一些问题:投入强度总体不足、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整体较弱、高技术产业规模较小等。这些问题和浙江企业科技创新带有鲜明的应用导向这个特点紧密相关。首先,应用性创新不会像基础性创新那样发生巨额的研发投入。其次,科技资源向应用创新活动集中,使企业用于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和进行重大创新活动的资源相对有限。最后,浙江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通常和应用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联系在一起。与长三角其他地区不同,浙江的电子信息产业制造这类高技术产业数量不多,已有的高技术企业中有不少是依托当地具有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的基础延伸和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的效益水平较好,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讲的中国高技术产业普遍存在的低技术、低收益的情况。以上特点都曾经是浙江企业在科技竞争中占优地位的表证,它们同时也标示着浙江在未来科技竞争中可能处于劣势。这些问题的存在,为今后浙江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全国及浙江省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
2.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 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年版。
3.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年版。
4. 浙江省统计局编:《浙江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年版。
5. 《浙江概览》编委会编:《浙江概览 2005 年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6. 《(2006 年:长三角可持续的率先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
7. 《浙江蓝皮书—2006 年浙江发展报告(经济卷)》,杭州出版社,2006 年版。
8. 吕祖善:《关于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报告》,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2006 年 1 月 16 日。

-
9.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转型和跨越的新探索—浙江省“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年版。
 10.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进一步支持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政策调研材料汇编》，2005年8月。
 11. 浙江省统计局：《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现状分析》，统计研究报告。
 12. 浙江省统计局：《“十一五”时期浙江省收入变动趋势及分配导向政策研究》，统计研究报告。
 13. 浙江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2005年全省社会治安情况综述》、《浙江省2002年社会治安形势分析报告》。
 14. 孙金霞、沈锡权：《浙江统筹城乡发展奔小康》，《半月谈》，2004年第4期。巧，沈宇翔、金连升：《浙江“十一五”新课题：构建循环经济“静脉”》，《浙江日报》，2005年5月25日。